

经学研究论文选

彭 林 /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学研究论文选/彭林编.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12
ISBN 7-80622-843-8

I. 经... II. 彭... III. 经学-研究-文集
IV. B2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0668 号

责任编辑 徐力励

封面设计 傅惟本

技术编辑 张伟群

经学研究论文选

彭 林 编

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358 千字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80622-843-8/B·12

定价: 25.00 元

前言

经学,是以儒家经典为研究对象的学问。至迟在春秋时期,《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的雏形就已出现。经过孔子的删削与整理,六经成为他教授三千弟子的教材,从而奠定了儒学的基本格局。六经自身具有重要的价值,孔子又为之注入了崭新的人文内涵,因而受到社会的广泛重视。秦灭之后,《乐经》亡佚,仅剩五经。西汉起,五经被列入学官,与统治思想相结合,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故而对古代中国的政治和思想、文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学术文化的渊藪。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的数量不断增加,到唐代,《礼记》、《公羊传》、《谷梁传》等“属传、记”的文献也被列入经的行列,成为十二经。到宋代,原属子书的《孟子》也升格为经,十三经的格局由此而定。一代又一代的学者,从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出发,对儒家经典进行诠释和发挥,使经学面貌不断更新,不仅形成了各种流派,而且促进了新学科的产生。著名经学史家周予同先生在《经学历史》的前言中指出:“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决不是什么武断或附会的话。”

清亡之后,经学独尊的局面终告结束。虽然其后经学的研究

并没有终止,但在学校教育中却一度被废止,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出现了许多问题。儒家十三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其内容涉及古代文学、哲学、史学、礼俗、制度、语言等,几乎遍及古代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对儒家经典的无知,必然导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淡漠。而中国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首先要保持固有的优秀文化,然后才谈得上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长。因此,许多学者撰写了向大众普及经典的注疏,廖平等的《经学初程》、《群经大义》,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唐文治的《十三经提纲》、《十三经提要》,陆德懋的《中国经书之分析》,吕思勉的《经子解题》,蒙文通的《经学抉原》,刘师培的《经学教科书》,卫聚贤的《十三经概论》,钱基博的《经学通志》,范文澜的《群经概论》、《经学讲演录》,周予同的《怎样研究经学》、《群经概论》,金景芳的《研治经学之方法》,蒋伯潜的《十三经概论》、《经学纂要》等,即其荦荦大者。

一些学者还为经学在学校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努力。近年,华东师范大学发现学术大师王国维的一件遗稿,内容为介绍十三经价值与流变。此稿作于1925年,正值王氏移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之年,或系王氏畅论于清华学堂的讲稿。王国维是近代史学的开山,是最早提倡用西方学术方法治史的学者,而对经学的态度如此,发人深思。王氏融会中西,既热心西方学术,又精熟于传统学术,所以能创立“二重证据法”,而且游刃有余。1942年,在昆明西南联大执教的朱自清先生写下了著名的《经典常谈》,指出“读经的废止,并不就是经典训练的废止”,“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他大声疾呼,主张“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的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做一个有相当教育的国民,至少对于本国的经典,也有接触的义务”。朱自清的呼吁,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经典常谈》也被一再重印,版本达三十余种之多。

经过“文革”的学术低迷之后,经学研究再次复苏。海内外学人,尤其是海峡两岸的学者,撰写了大量的论著,以经籍为研

研究对象的硕士、博士论文也日见其多。1994年,林庆彰教授克服各种困难,在台湾创办《经学研究论丛》,成为海内外第一份、也是迄今仅见的一份经学研究刊物。林先生倡导“以最平实的态度来研究传统经学”的学风,使该刊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到1999年止已出版7期,除刊登经学研究论文之外,还登载了大量出版资讯、专题书目、经学学术会议报道方面的信息,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欢迎。考虑到林庆彰先生主编的《经学研究论丛》仅在台湾地区发行,大陆读者不易见到,所以从《经学研究论丛》刊登的近百篇论文中挑选出十余篇,编为《经学研究论文选》,读者可以由此窥知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学研究的风格与旨趣。

可以预见,新世纪的经学研究必将取得全新的进展,除了经学研究的积累日益厚重的原因之外,古代佚文的不断出土,是我们或能超迈前贤的重要条件。20世纪50年代,甘肃武威磨咀子一号汉墓出土了《仪礼》汉简。70年代,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帛书《周易》,河北定州八角廊汉墓出土了《论语》残本,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出土了《诗经》残本。1995年,在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楚简中,发现了完整的《礼记·缙衣》篇,《礼记》其余诸篇的文句,在楚简中也时有所见。近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回的楚简中,又发现了战国时代的《周易》。这些自秦汉以来逐渐散佚的珍贵资料,为研究先秦、西汉时期经学的文本与流变以及学派与学术思想等,提供了全新的、丰厚的资源,将使经学研究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局面。我们将及时向广大读者推荐有关的研究成果。

本书的选编,得到林庆彰教授的无私支持,谨致三申谢忱之意。

彭 林

目 录

五代十国的经学	冯晓庭	1
宋初古文学家的经学观析论	冯晓庭	32
正续《清经解》编纂考	虞万里	48
清代今文学派发展的两条路向	蔡长林	75
庄大久之经学研究	汤志钧	101
李鼎祚《周易集解》略论	许维萍	115
《诗经》三《颂》毛序与朱传异同之比较研究	王清信	128
梅鹗《尚书谱》研究	林清彰	146
《尚书谱》、《尚书考异》成书先后的问题	许华峰	170
《仪礼疏》探原试例	陈秀琳	183
姚际恒之《仪礼》学	奚敏芳	196
论清人《仪礼》校勘之特色	彭 林	216
元代之《礼记》学	魏慈德	237
论三传不书之例	赵生群	253
《左传》预言之基型与作用	张高评	288
《左传》与两汉经学	郭 丹	305

五代十国的经学

冯晓庭

一 前 言

公元 907 年,朱温 (852—912)篡唐自立,建立后梁,中国历史开始步入五代十国时期。虽然只延续了短短五十四年 (907—960),而且学者也总是习惯以“隋唐五代”一词来呈现五代十国文化为隋唐文化延续与附庸的概念,但是就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处于文化过渡阶段的五代十国时期是不是完全“墨守旧制”,或者是曾经出现“承先启后”、“开启新局”的状况,似乎是必须详加探讨的问题。因此,将五代十国时期的学术发展视为一个独立环节论述其中的各项命题,应该是必要的。

针对五代十国时期的经学发展进行研讨活动,通常会遭遇以下两项困难:其一,文献的不足。由于五代十国时期的政治局势变动剧烈,社会环境也不稳定,因此当时完成的经学作品几乎都已亡佚殆尽,想要借五代十国学者的专著直接探讨当时的经学研究风貌,可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其二,学者时代归属判定的困难。由于五代政权仅仅持续了五十四年,因此单单活跃于五代十国时期的学者可以说相当稀少,大多数的学者不是由唐入五代就是由五代入宋,于是在混乱世局导致相关记载阙如的状况下,要明确地

判定学者的时代归属便显得困难重重。

尽管关于五代十国时期经学发展的研究活动面临着上述的基本阻碍,然而在分析现今留存的文献史料之后,可以发现论述五代十国时期经学发展面貌的构想仍然是可行的。基于这个认识,笔者将依循相关文献的所属性质分别叙述五代十国时期“官文的经学政策”以及“一般学者的经学研究”于下,希望能够借此厘清五代十国时期经学发展的梗概,并申明五代十国的经学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二 五代十国时期政府的经学政策

五代十国各朝政府与经学发展有关联的政策主要展现于科举考试、经书刊刻以及搜求图书三方面,这三项政策基本上都是前有所承,五代十国政府可以说接续了唐代的固有基础而进一步实行了对后来经学发展颇有影响的措施。

(一) 科举考试的持续推行

除了《五代会要》之外,关于五代政府科举考试政策的文字记载并不多,至于十国方面的记载则为数更少,仅有零星几则。因此,要探讨本时期科举考试对经学研究的影响,只能以五代部分为叙述重心。五代政府所施行的科举考试制度基本上沿袭自唐代,而唐代诸科考试中以经学或是经书为主要测验范围的最重要项目是明经科,从《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中可以知道明经科考试的主要内容是“帖文”与“口试,问大义十条”两项(卷四四,页1161)。

所谓“帖文”,也称为“帖经”,就是经文背诵测验。测验的方法为何?《通典·选举志》提道:

“帖经”者,以所习经掩其两端,中间开惟一行,裁纸为

帖,凡帖三字,随时增损,可否不一。……(《选举三》卷一五,页83)

根据杜佑(735—812)的叙述,可以知道“帖经”的具体作法是:其一,先掩盖住应试者所习经书某页的两端,空出其中一行经文;其二,在该行经文中以纸条覆盖住其中几个字(通常是三个字,但可随主考的意思增减);其三,令考生写出被覆盖住的经文。这个方式其实与今日考试惯用的填充题相当类似。

至于“口试”、“问大义”,通常被称为“口义”,主要是由考官当面询问考生经书大义,但是因为当面问答的方式无法再行稽考,易生弊端,于是后来便改为“墨义”,也就是以书面形式进行考核。然而不论是“口义”或“墨义”,应考者都必须依照政府编定认可的说解文字(主要是唐初孔颖达[574—648]等人修纂的《五经正义》以及在唐代陆续获得官方承认的诸经正义)照章一字不改地回答,因此“墨义”方式虽然被冠上担负考验学子对经书大义认识的重责,却只能算是对应考者背诵能力的再测试。

在了解唐代明经科考试的方式与实质内容之后,学者不难发现,背诵能力是当时明经科考试最注重、同时也是惟一的品评标准。事实上,要求学者清晰地背诵经文,即使在今日仍然不能算是落后的观念,但是在功名利禄的引导之下,这个方式开始对经学研究产生不良影响。

在“帖经”方面,根据《新唐书·选举志》的记载,作为明经科考试范围的“正经”有九部,其中“《礼记》、《左传》为大经”,“《毛诗》、《周礼》、《仪礼》为中经”,而“《周易》、《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区别的标准很显然是经书的字数篇幅。至于应考者则有“通二经”、“通三经”、“通五经”的分别,而无论研习哪一类,所有参加明经科考试的考生都必须研习《孝经》与《论语》。因为考试是以背诵为主,为了能够比较容易地取得利禄,学子当然会选择学习篇幅较小的经书。就经书义理的追求而言,文字的多寡并不能成为经

书难易的评断标准,然而在专主背诵的制度之下,篇幅的大小就是经书难易的绝对指标。在这个观念之下,终于形成了明经科诸人“以《礼记》文少,人皆竞读”(《唐会要·贡举上》“帖经条例”卷七五,页1630),“《左传》卷轴文字,比《礼记》多校一倍,《公羊》、《谷梁》与《尚书》、《周易》多校五倍”,虽然朝廷制定了奖掖的办法鼓励学子,但是“明经为《(左)传》学者,犹十不一二”的严重投机情况(《唐会要·贡举中》“三传”卷七六,页1665)。研究经学的学子不以时代需要或是学术责任作为学业科目选取的考量,却以字数的多寡作为选择的标准,使某些经书几乎成为“绝学”,从此看来,“帖经”给经学发展带来的不良影响是相当严重的。

在“口义”与“墨义”方面,背诵的方式除了使学子对所习经书作出错误的选择之外,这个方式本身的规范也给经学发展带来严重影响。“口义”与“墨义”对经学研究者的思想的箝制,唐人柳冕(?—805)在《与权侍郎书》一文中说得很清楚:

自顷有司试明经,奏请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其有明圣入之道,尽六经之义,而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文苑英华·书二十三》“荐举上”卷六八九,页2上)

虽然柳冕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用意是希望政府能够以合理的方式选拔人才,并非用来批判“口义”、“墨义”之法,但是从他的叙述之中,却可以发现这个考试方式保守性极强的真正内涵,应考者面对官方所提出有关于经书大义的问题,只能消极地完全以官方所认定的注与疏作答,不仅在对经义的认识方面必须严格遵守,就连文字也不能稍有逾越。于是,在“不能诵疏与注,一切弃之”的原则之下,官方展现了非常强硬的态度,这不但代表士子将会为了求取利禄而专心背诵官方所认定的标准说解,也再一次强调了官方标准的不可怀疑性;同时,既然“明圣入之道,尽六经之义”无助于仕宦之途,对经书义理积极而确实的追求也当然要置诸脑后了,所以,一切相关的思考活动也就从此缓慢下来。从上述文字看来,明经

科考试以政府认定的注、疏作为“口义”与“墨义”的绝对标准,虽然就考试制度本身来说是公平的,但就在这个标准制度之下,学者失去了检讨的空间,也丧失了反省批判的能力与勇气,所能作的只是一再地因循。笔者以为,《五经正义》之所以能够自唐初至宋初畅行三百余年,极少遭受攻讦,或者是因为该书“体大思精”,在当时的确“详实可据”,而科学制度彻底地箝制了学者的思想,应该也是重要原因。

除了测验办法本身有问题之外,主考官员选取试题的态度也对士子研究经学的意向与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为了增加人才选拔的周密与严格性,唐代明经科考试的精神内容逐渐偏颇。开元十六年(728)十二月,国子祭酒杨珣就曾经上奏指出当时掌理明经科考试的官员往往不详考经书“述作之意”,而“每至试帖,必取年头月尾,孤经绝句”为题(《唐会要·贡举上》“帖经条例”卷七五,页1630)。相同地,杜佑在《通典·选举志》里也说道:由于应考士子人数增多,官方为了严格选拔,所以“其法益难”,“有孤章绝句、疑似参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余一二字,使寻之难知”。在考官态度日益扭曲与考题难度日益增高情形之下,应考举子不得不提出对应的办法,最后竟然产生了“举人则有驱悬孤绝、索幽隐为诗赋,而诵习之不过十数篇”的现象。于是,为了考试及第、应付艰难怪异的试题,学子舍弃了经书研究的正途,仅仅在十几篇支离的文字中埋首钻研,最后终于导致读经者不愿意全面研读经书,对于经书中的“平文大义或多墙面焉”的恶劣状况(《通典·选举志三》卷一五,页83)。笔者以为,学者既然不愿意也不能按部就班、头尾完整地研读经书,一般学子的经学研究层次因此而降低当然是可想而知的结果了。

五代政府承袭唐代制度,以经书经学为考试范围的明经科仍然保存。其项目则与唐代稍有不同,分为“九经”(研习九部经书)、“五经”(研习五部经书)、“学究一经”(专研一部经书)三者,范围则

与唐代成立的“九经”无异。根据《五代会要》的记载,到了五代末期的后周太祖(904—954)广顺三年(953),“九经科”要测验“‘帖经’一百二十道、‘墨义’二十道”,“五经科”要测验“‘帖经’八十道、‘墨义’二十道”,“学究一经”则要测验“‘念书’二十道、‘对义’二十道”(《五代会要·科目杂录》卷二三,页288)。就上述的测验内容来看,虽然这只是一个部分取样,但是和唐代相同,背诵经文与注疏的能力依旧是当时考试的惟一重心却是不争的事实。虽然文献记载不足,但是在基本环境不变的前提之下,说唐代科举制度对经学研究造成的阻碍依旧存在于五代,应该是可以成立的。

除了纯粹的文字背诵书写之外,后唐庄宗(885—926)曾在同光三年(925)颁布诏令,指示明经科的主试委员在考生“帖经”完毕之后“引试对义时”,应该“于大义泛出经问义五道,于帘下书试,只令隔帘解说,但不失注、疏义理,通二通三,然后便令念疏,……”(《五代会要·科目杂录》卷二三,页287)。当时的明经科考试是否必须测验“墨义”,在这则记述中并不能够得到确认,然而其中有关考生回答经义必须“不失注、疏义理”的规定,却是五代政府透过科举考试将当时经学研究的范围限制在汉唐“注疏之学”内的明证。

生于后梁,历仕后晋、后汉、后周,终于宋代的窦仪(914—967)曾在《条陈贡举事例奏》一文中说道:

(举子)才谋习业,便切千名。《周》、《仪》未详,赴三《礼》之举;《公》、《谷》不究,应三传之科。经学则偏试帖,由进士则鲜通经义,取解之处,诤张妄说,……(《全唐文》卷八六二,页5下)

在这段文字里,窦仪批评了当时以经学为应考范围的考生未曾通读经书便贸然参加考试,而国家考试偏重背诵致使经书义理不彰、应考进士科学子对经学大多一窍不通,导致曲解妄说滋生的状况。虽然这则记载并非专门针对明经科考试的弊端而发,但是窦仪的

叙述却直接说明了当时一般学子的经学研究水平极其低落,也同时间接证明了五代政府所施行的科举政策对当时经学的研究与发展深具破坏作用。

(二) 经书文字的刊刻印行

五代十国时期由政府所主持的经书文字校定与刊刻工作共有两项,一是五代政府的经书雕板印刷,一是十国中后蜀的石经雕凿。

1. 五代政府的经书雕板印刷

在经书文字的统一校勘方面,因为雕板印刷的确实施用,五代各朝政府的表现显得相当活跃。后唐明宗(867—933)长兴三年二月(932),当时中书、门下二省的官员冯道(882—954)、李愚(?—935)“奏请依石经文字(唐开成石经)刻九经印板”,明宗基于自从“兵革以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克精研”,导致经书的传写“亥豕有差,鲁鱼为弊”,为了避免“一言致误则大意全乖”,使得经书义理的传承产生“渐当纰缪”的考量,于是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子细看读”,开始了雕刻印板的准备工作;四月,勘读抄录经文与附加注文诸事告终,马镐、陈观(889—962)、段颙、田敏(880—971)四人又受命担任详勘官,再次进行校勘;文字的订正完全结束之后,明宗接着委任国子监“于诸色选中人,召能书人谨楷写出”,并“付匠人雕刻”,于是,雕板印刷经书的工作正式开始进行。到了后汉隐帝(931—950)乾祐元年(948)四月,国子监儒臣上书说道:

在监雕印板九经内,只《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今欲集学官较勘四经文字,雕造印板。(《册府元龟·学校部》“刊校”卷六〇八,页30下)

从国子监儒臣上奏的文字中,可以发现当时《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五部经书的印版其实已经雕刻完毕,经学史上

第一部由政府刊刻发行的经书或许已经在广为流传。另一方面,对于校定刊刻“二《礼》二传”经文、注文要求,隐帝作了正面回应,于是儒官聂崇义等人开始进行第二阶段工作。后周太祖(904—954)广顺三年六月,“十一经及《尔雅》、《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板成,国子监事田敏上之”,于是,持续了二十一年(932—953),历经了四个朝代(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经书印板的雕刻工程到此完全结束。

除了经文与注文之外,五代学官也开始刊印唐代陆德明(550—630)编纂的《经典释文》。后周世宗(921—959)显德二年(955),国子祭酒尹拙(891—971)因为“陆氏《释文》,唐初撰集”,“绵历岁月”,以致“传写失真”,所以上奏要求“较勘《经典释文》,雕造印板”,在世宗的支持之下,儒官尹拙、张昭、田敏、聂崇义、郭忠恕(?—977)等人于是开始进行校勘《经典释文》。然而这项工作在五代时期并未全数完成,一直到了宋代初年,《经典释文》的刊本才得以完全通行。^[1]

分析五代时期中央政府雕印经书文字的记载,可以知道:其一,五代的经书刻本在内容上完全因循着唐石经的制度,除了九经之外,还包括了《孝经》、《论语》、《尔雅》三者,并且附加了唐代官方两次整理经书文字的成果——《五经文字》与《九经字样》两书,在这个传递之下,不但前后朝代之间政策袭用的痕迹历历可见,经书体系逐渐形成的脉络也显得相当清晰;同时,《经典释文》的校勘与付梓,除了证明了该书仍旧是当时学者认识经书文字或义理的重要媒介外,也是了解汉唐注疏之学说解系统成立过程的重要依据。其二,五代政府刊刻的经书印本除了经文之外,还包括收入各经的注文,除了可以作为官方再度标示经学说解正宗的指标之外,也同时使得注文与经文更紧密地结合,成为后世刊刻经书将经、注、疏汇一形式的先导。其三,经书印本的发行,除了代表着中央政府从此具备了可以流传久远并且影响广大的有力工具,在统一经书文

字方面将表现得更有效率以外,在经典普及的情况下,也同时为后世经书经学的扩大流传奠定了良好基础。笔者以为,五代政权发行经书印本虽然并非伟大发明,然而却是经学能够在当时兵燹时兴、政治与社会秩序纷乱的大环境中得到延续,到宋代重新发皇的重要原因,而宋代官方能够在立国之初的数十年中完成十二部经书与经说(主要是各经的疏)的整理工作,应该可以说是延续了这个自从五代时期就已经确立施行的重要政策。

2. 蜀石经的雕凿

后蜀后主孟昶(919—965)广政元年(938),后蜀政府下令招选“士大夫善书者”,由毋昭裔总领其事,开始石经的雕凿工作。广政七年(944),《孝经》、《尔雅》、《论语》三书雕凿完成,后主于是又命毋昭裔依照唐代开成石经的制度刊刻九经。广政十四年(951),《周易》刊刻完毕;从此一直到后蜀亡国(965),共有《毛诗》、《尚书》、《仪礼》、《礼记》、《左传》(至卷一七)诸经先后完成。之后《左传》(自卷一八以后)、《谷梁传》、《公羊传》完成于宋仁宗(1010—1063)皇祐元年(1049),《孟子》则完成于宋徽宗(1082—1135)宣和六年(1124)。自开雕到完成,一共历经一百八十七年。除了总领其事的毋昭裔之外,各经的书写人分别为:

《孝经》、《论语》、《尔雅》——张德钊

《周易》——杨绉、孙逢吉

《尚书》——周德贞

《周礼》——孙朋吉

《毛诗》、《仪礼》、《礼记》——张绍文

《左传》——蜀人书,未题书写人

《公羊传》、《谷梁传》——田况(1005—1063,宋人)

《孟子》——席旦、彭慥(1026—1071,宋人)

蜀石经又名广政、孟蜀、后蜀、成都、益都石经,在形制方面以唐石经为底本,而附加注文。笔者以为,蜀石经的刊刻在经学史上

的意义为;其一,根据晁公武(1105—?)《石经考异》的考证(原书已亡逸,以下所列叙述文字是根据宋人范成大[1126—1196]《石经始末记》的载录),其中文字与五代及宋代中央政府所雕印板出入颇多,除了在版本形式上,“《周易·说卦》‘乾,健也’以下有韩康《易注》、《略例》(王弼[226—249]《周易略例》),有邢琇注,《礼记·月令》从唐李林甫(?—752)改定者”,“监本皆不取”之外,各经经文与刊本有差异的“《周易》经文不同者五科、《尚书》十科、《毛诗》四十科、《周礼》四十二科、《仪礼》一十一科、《礼记》三十二科、《春秋左氏传》四十六科、《公羊传》二十一科、《谷梁传》一十三科、《孝经》四科、《论语》八科、《尔雅》五科、《孟子》三十七科”,而且“其传、注不同者尤多”,已经达到“不可胜计的地步”,单就晁公武对部分篇幅的初步校定以及统计,二者的歧异竟已经达到“三百二科”;虽然当时学者大多认为蜀石经“校写非精”,少有推崇,但是在宋初官方颁布完成于五代的刊本为经书定本,同时“收向民间写本不用”,因而导致“有讹舛,无由参校,判知其谬”,使学者认为“官既刊定,难于独改”的情况下,蜀石经对于五代与宋代中央认可颁布的经书刊本文字或许有相当程度的辅助实正作用(《全蜀艺文志》卷三六,页8上至8下)。《宋史·儒林传》记载五代官方负责校定经书文字的田敏在校书时“颇以独见自任”,经常依照本身的意见改动经书,如改“《尚书·盘庚》‘若网在纲’为‘若纲在纲’”、改“《尔雅》‘椴,木槿’注‘日及’为‘白及’”,常为当时人所诟病,如果这些争议能够参酌蜀石经,或许能够寻得较中肯与合理的解答。其二,蜀石经的雕凿较五代经书印板的刊刻晚了六年,其中是否有因袭的关系,现今已无从探究,而不论是否有关连,二者都有将各经注文附入的措施,可以说是五代十国时期注文必须随着经文流传的观念已经确立、而且汉唐注疏之学体系已初略形成的有力说明。其三,虽然雕凿的工作延续了几乎两百年,在提供学子正确经书文字以及经学传播的功能上显得有些缓不济急,但是蜀石经却是中国经学史上

第一次将所谓的十三经汇集为一体的伟大创举；尽管《左传》的后半部、《公羊传》、《谷梁传》完成于北宋中期，《孟子》完成于北宋中晚期，与五代十国时期已相去甚远，但是蜀石经逐渐成立的过程却是中国经书体系由九经而十二经、由十二经形成十三经的最具体例证，而这样的结果，同时也是《孟子》一书成为经部书籍，日渐受到政府与学者重视的最清晰说明。^[2]

3. 各代政府对书籍文献的搜求

五代与十国诸政府承续了肇始于唐代安史乱后的各种纷扰，又处于兵燹频仍、兴替迭起、各自分裂的局面，在政权毫无保障、社会秩序丕变的恶劣情势下，政府对于文化活动以及文化财产的保护与推行，自然会显得力有未逮，而当时文献的丧失的状况，《册府元龟》与马端临的记载多少可以说明一二：

后唐庄宗同光二年(924)二月制：三馆(指唐代的昭文馆、集贤馆、史馆)、兰台，藏书之府，动盈万卷，详列九流。爰自离乱，悉多遗逸，须行搜访，以备讨寻。

(同年)四月，枢密使郭崇韬(?—926)又奏曰：伏以馆司四库藏书，旧日数目至多，自(唐僖宗[862—888])广明年(880)后，流散他方，宜示奖酬，俾申搜访。(《帝王部·崇儒术二》卷五〇，页16上至16下)

(后)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文献通考·经籍一》“总叙”卷一七四，页1508上)

虽然这三段文字中有两项所陈述的是后唐庄宗同光二年的史事，而且前后仅仅间隔两个月，但是从后唐庄宗、郭崇韬、后周世宗的叙述里，可以发现：其一，原本庋藏丰厚的中央图书管理机构因为战争与纷乱的关系自唐代末年开开始陆续流失大量的书籍文献，一直到五代，情况仍未改善。其二，五代中央政府已经体认到书籍文献流失的事态严重，于是开始拟定推行征访典籍的政策。在相关